

# 近代史研究

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

1

2004

## 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

罗检秋

---

**内容提要** 乾嘉汉学鼎盛之时,汉宋对峙更加凸显,但因寻求义理的内  
在需要,其中又滋长着调融宋学的潜流。汉、宋之学陷入困境,士人乃日益从  
今文经发掘“微言大义”,从而落实由考据以求义理的主旨。今文经学因之兴  
起,并在晚清经世致用及汉学义理化趋向中发展起来。

**关键词** 汉宋调融 今文经学 常州学派 义理

---

### 一、引言

由于士人治学方法及重心不同,汉学和宋学成为儒学两大范  
式。至清代,经学大盛,学者注重师法,汉、宋分野更加凸显,汉、宋  
关系也成为认识清学嬗变的窗口。清末以来,一些论著从不同角度  
涉及清代汉宋关系问题<sup>①</sup>,但它对学术格局的影响仍待进一步

---

① 近年这方面较有影响的论文如龚书铎的《晚清儒学论略》(收入《近代中国与文化抉  
择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)论述了道咸以后汉宋兼采、汉宋调和的趋向;  
艾尔曼(Benjamin A. Elman)“Criticism as Philosophy: Conceptual Change in Ch'ing  
Dynasty Evidential Research”一文[(台北)《清华学报》第17卷1、2期合刊,1985年,  
第165—198页]讨论了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。

讨论。

清末经学家皮锡瑞说：“国朝经学凡三变。国初，汉学方萌芽，皆以宋学为根柢，不分门户，各取所长，是为汉宋兼采之学。乾隆以后，许、郑之学大明，治宋学者已鲜。说经皆主实证，不空谈义理，是为专门汉学。嘉、道以后……学者不特知汉、宋之别，且皆知今、古之分。”<sup>①</sup> 嘉道以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清代学术的重要转变，自然是晚清以来文人学士的重要议题。晚清名士李慈铭读了魏源的《古微堂外集》后，感慨“自道光以来，经学之书充栋，诸儒考订之密，无以复加。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，苦其繁富，又自知必不能过之，乃创为西汉之说。”<sup>②</sup> 李慈铭好讥弹人物，于经学一贯尊古抑今，此类言论当然不足为据。其后，章太炎、皮锡瑞等人对此也有评论。梁启超则认为：道咸以后清学的分裂，“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，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”。前者指清学本身尊古善疑的取向，因学者“既尊古矣，则有更古焉者在所当尊；既善疑矣，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？”于是由东汉古文经溯至西汉今文经、乃至先秦诸子。而所谓“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”，则指道咸以后的经世致用思潮。<sup>③</sup> 但乾嘉汉学盛炽之际，经世取向对士人影响尚不明显。故周予同进而指出，庄存与、刘逢禄为代表的前期今文学乃“发于学派自身”，龚自珍、魏源、康有为等后期今文学则“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”。<sup>④</sup> 这种区分不无道理。不过，所谓“前期今文学”和“后期今文学”均非单一因素促成，惟诸因素重要

① 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41页。

② 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第8册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3825页。

③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三十四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51页。

④ 周予同：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》，朱维铮编：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（增订本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519页。

性不同。

清末以来,研究者多从经世思潮考察今文经学的兴起,而对乾嘉之际常州学者转治今文经学的原因缺少分析。近年有论者提出,应从庄存与政治上受和珅排挤事件分析今文经学的起源。<sup>①</sup>一些学者则持异议,认为今文经学起因于庄存与、和珅的政治斗争说,“现在还只能是假说”<sup>②</sup>。

乾嘉经学为何由“古”而“今”并且蔚成风气?我们虽应注意政治斗争及经世思潮的影响,但在社会变动尚不明显的背景下,学术理路尤需重视。皮锡瑞指出嘉道学者开始“知今、古之分”,主要从学术壁垒的建立看待清学演进。学术的转变既基于修正前人而开宗立派,又在于汲取、调融它学。清代今文经学虽沿“知汉、宋之别”到“知古、今之分”这一路向演进,却也受调融汉宋潮流的推动。简言之,在考据学鼎盛之际,汉学自身对于义理的需要促使人们补偏救弊,从今文经阐发“微言大义”,导致学术转变。

## 二、考据学勃兴与汉、宋紧张

作为传统学术的基础,考据学兴起于汉代并传衍于后世。唐、宋两代,注疏、辨伪之书层出不穷。宋儒虽重义理,而朱熹、王应麟等人诠释儒经仍重注疏。元、明两代,士人尚谈心性,辨伪、考据之学仍延绵不绝。明末社会危机加深,忧时救世的士大夫反思心学弊端,倡导实用、经世之学。明、清鼎革之后,学术由虚返实之势进

---

① 艾尔曼认为,庄存与在1780年代转治今文经学与乾隆晚年和珅专权、庄氏被迫退出全国政治舞台相关。见氏著《经学、政治和宗族——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② 刘大年:《评近代经学》,《明清论丛》第1辑,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,第2页。

一步发展。从顺治到康、雍,相对笃实的理学渐受朝廷青睐,由学术支流上升为高踞堂庙的正统学术。顾炎武等在野学者则倡导“经学即理学”,清代学术走上了“回归原典”的不归路,儒学重心也从“四书”转向“五经”。这不仅一改明儒空谈性理、束书不观的积习,且在宋学之外另辟蹊径,形成考据儒经的趋向。惠栋治《易》标举汉学旗帜,一些人解经、注经皈依于东汉经师,汉学亦成考据儒经之别称。考据学兴起之时,一些宋学家也力摒“空言穷理”、“荒经蔑古”的恶名,彰显宋学的考据内涵。

考据学从江南一隅迅速影响全局,促使学术文化格局发生裂变。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,汉学盛极一时,成为多数学者的共同学术话语。正如焦循所说:“国初经学,萌芽以渐而大备。近时数十年来,江南千余里中,虽幼学鄙儒,无不知有许、郑者。”<sup>①</sup>他们不仅指斥宋学空疏,也从不同角度摧毁宋学的理论基石。有的汉学家如阎若璩、汪中等通过辨伪、考证,对宋学依据如《大学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的“十六字心传”、河图洛书之类予以否定,有的汉学家如戴震、凌廷堪、焦循等人对宋学的性、理、天道等主题进行了考证和重释,一些汉学家如钱大昕则在文章著述中尊汉抑宋。

到乾隆后期,汉学已走出江南一隅。朝廷开四库馆当然不只是学术事件,也象征着考据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官方学术。所谓“乾嘉以来,朝士崇尚汉学,承学之士,翕然从风,几若百川之朝东瀛,三军之随大纛”<sup>②</sup>。随着汉学阵营的扩张和政治地位的上升,士人治学的价值取向逐渐转变,排斥宋学的倾向更加明显。戴震说,循宋儒经解,“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,误图他人之貌而事

① 焦循:《与刘端临教谕书》,《雕菰楼集》卷13,苏州文学山房刊本,第25页。

② 陈康祺:《唐确慎公理学》,《郎潜纪闻初笔》卷6,《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》上册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128页。

之”，“实诱吾族以化为彼族”。<sup>①</sup>主持四库馆的纪昀对今文经学还比较宽容，但对宋学及桐城派明显排斥，其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已有体现。阮元有言：“盖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，析诗文流派之正伪，主持风会，非公不能至于此。”<sup>②</sup>四库馆开设之初，姚鼐受朱筠推荐入馆撰写提要，却因其宋学根柢，所撰常遭其他馆臣抵制，姚氏最后只得离开。后来姚莹说：“自四库馆启之后，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，无复有潜心理学者，至有称诵宋、元、明以来儒者，则相与诽笑。”<sup>③</sup>姚莹所说或许有点夸张，却反映了姚氏祖孙的深切感受。汉学如日中天，“汉学名臣”也接踵登台。

民间汉学家的学术取向也相类似。戴震说，“义理者，文章、考核之源也。熟乎义理，而后能考核、能文章。”他治学基于考据而不废义理。其弟子段玉裁则“以为义理、文章，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……夫圣人之道在《六经》，不于《六经》求之，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理，以行于国家天下，而文词之不工，又其末也。”<sup>④</sup>两代人的学术重心显然不同。即使兼治义理的戴震，对宋学也多反感。至于博学多才的汪中，究心于诸子义理，但“最恶宋之儒者，闻人举其名，则骂不休……汉唐以后所服膺者，昆山顾氏、德清胡氏、宣城梅氏、太原阎氏、元和惠氏、休宁戴氏。”<sup>⑤</sup>乾嘉之际，汉、宋关系日趋紧张。

① 戴震：《答彭进士允初书》，《戴震全集》第1册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18页。

② 阮元：《纪文达公集序》，《研经室三集》卷5，上海涵芬楼影印初刊本，第2页。

③ 姚莹：《复黄又园书》，《中复堂全集·东溟文外集》卷1，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》（52），台北，文海出版社，第34页。

④ 段玉裁：《戴东原文集序》，《戴震全集》第6册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458页。

⑤ 凌廷堪：《汪容甫墓志铭》，《校礼堂文集》卷23，嘉庆十八年刊本。

另一方面,宋学家对汉学也有不少讥评。乾隆朝的理学大臣翁方纲对阎若璩的考据研究不以为然,认为《古文尚书》虽不无可疑之处,“然义皆醇正,列于学官久矣,即如其中一二偶见他书者,安得从而议之?”<sup>①</sup>他还专门撰文驳斥戴震关于“性”、“理”的考证。<sup>②</sup>桐城派的姚鼐更认为士人“相率而竞于考证训诂之途,自名汉学,穿凿琐屑,驳难猥杂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,其识解更卑于永嘉,而辄敢上诋程朱,岂非今日之患哉!”<sup>③</sup>宋学对汉学的反感可见一斑。

汉、宋冲突不久就在两广总督阮元幕中达到高潮。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于嘉庆十七年(1812年)撰成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,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年在阮元幕中刻成,批评“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,不究礼乐之源,独标性命之旨。义疏诸书,束诸高阁,视如糟粕,弃等弁髦。盖率履则有余,考镜则不足也。”<sup>④</sup>阮元为之作序推介。此书撰成于汉学炽盛之时,体现了尊汉抑宋的氛围。

乾嘉年间,批评汉学的言论以桐城文派最为激烈。他们并非理学重臣,也缺少学理创新,但并非如有的经学家所指的无聊文人或趋炎附势之徒。桐城派对汉学的批评虽有偏激之词,却非毫无根据,有些可谓击中要害。道光六年(1826年),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,也在阮元幕中的方东树,于阮元转督云贵之际,撰成了《汉学商兑》,与江藩针锋相对。他指斥江藩著书“以辟宋儒、攻朱子为本”,又一一反驳江氏对宋学的批评,列举汉学弊端,并攻击其“名

① 翁方纲:《愚古文存序》,《复初斋文集》卷3,光绪三年刊本,第14页。

② 见翁方纲《理说驳戴震作》,《复初斋文集》卷7,第19—20页。

③ 姚鼐:《安庆府重修儒学记(代)》,《惜抱轩全集》,中国书店1991年版,第308页。

④ 江藩: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卷1,《汉学师承记(外二种)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,第6页。

为治经,实足乱经,名为卫道,实则畔道”。<sup>①</sup>集中体现了护宋斥汉的激烈态度。乾嘉年间,批评汉学弊端的言论不少,多见于私人信函,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则刊于作者卒后。再则,有清一代,桐城派并不像清初“理学名臣”那样显赫,其学术地位也不如汉学阵营,故方东树抨击汉学还是需要相当胆量的。不过,汉宋相攻的格局则如宋学家陈用光所说:“近时为汉学者诂详说之功,而鲜返约之思;为宋学者或又徒剿袭语录之绪余,而无自得之实。二者交讥而未有以相胜也。”<sup>②</sup>汉宋积怨益深而“又未有以相胜”,推动了士人在学术上自我反思。

### 三、汉学积弊与反思

江藩的态度反映了宗派观念,也暴露了汉学存在的问题。乾嘉学派崇尚“实事求是”,考订儒经,衍及小学、音韵、史学、天算、水地、典章制度、金石、校勘、辑佚等领域,在整理和保存古文献,完善考据学方法,开创证实学风诸方面成就巨大。但汉学的主流是东汉古文经学,注重“传事”而不重“传义”,导致思想枯萎。

乾嘉至道咸年间,士人对汉学积弊提出了不少批评,后来研究者对此注意较多。但是,一般论著多着眼于汉宋之间的相互批评,而对汉学家的自我反思注意不够。事实上,汉宋相訾不过是学术阵营的外部对立,冲击力相对较小,而学术流派的自我反思往往具有较大的震动和影响。可以说,乾嘉学派的自我反思直接引发其学术调整。大体说来,它集中于以下方面。

首先是对汉学的泥古积习及门户观念表示不满。中国士人历

<sup>①</sup> 方东树:《汉学商兑·序例》,《汉学师承记(外二种)》,第235页。

<sup>②</sup> 陈用光:《勉学堂记》,《太乙舟文集》卷4,道光十七年刊本,第13页。



来有好古积习,政教好谈三代,学术研究以古为尚,清学便在梁启超所谓“以复古为解放”的趋向中衍生出来。当时,“解放”的意义尚不明显,“复古”的旋律却非常高亢。他们所复之“古”不是孔孟,而是东汉注疏、训诂。惠栋承父、祖之学研究《易经》,学术上趋于专谨,却强化了“凡古必真,凡汉皆好”的风气。其弟子谨守家法,俨成吴派。复古取向以及伴随而生的门户观念对于汉学的建立不无作用,而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。即使汉学盛炽之时,“唯汉是好”的偏向也遭到一些人的怀疑,《四库提要》评论惠栋“其长 in 古,其短亦在于泥古”<sup>①</sup>。惠派自建壁垒,学传不广。皖派经学领域较广,但同样存在泥古积习和门户观念。方东树斥之为“但出于汉者主之,出于宋者非之。詫为辅经,实足乱经。始不过主张门户,既肆焉无忌,则专以攻宋儒为功。”<sup>②</sup>

当时,文史学者章学诚针对汉、宋对峙之势指出:“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,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。”章氏认为:“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,寓约礼而博文。”他又勾勒了朱学数传而至顾炎武、阎若璩的历程。<sup>③</sup>这说明,汉、宋之学本来具有内在联系。章氏之外,一些治学广博的汉学家如凌廷堪、焦循、王念孙、王引之等人都对汉学积弊有所认识。焦循对人们称乾嘉经学为考据学不以为然:“乃无端设一考据之目”,“补苴掇拾,不能通圣人立言之指”。<sup>④</sup>他还指出,士人标榜汉学,而“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,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。学者学孔子者也。”“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,于是拘于传注,往往扞格于经文。是所述者,汉儒也,非孔子也,而究之汉人之言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29,经部《春秋》类四,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242页。

② 方东树:《复罗月川太守书》,《仪卫轩文集》卷7,同治七年刊本,第6页。

③ 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·朱陆》,叶瑛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,中华书局1994年版,第264页。

④ 焦循:《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》,《雕菰楼集》卷13,第24页。

亦晦而不能明。”<sup>①</sup>王引之评论惠栋治学“考古虽勤，而识不高，心不细，见异于今者则从之，大都不论是非”<sup>②</sup>。他主张“孰〔熟〕于汉学之门户，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”<sup>③</sup>。凌廷堪指出汉学末流“袭其名而忘其实，得其似而遗其真。读《易》未终，即谓王、韩可废；诵《诗》未竟，即以毛、郑为宗；《左氏》之句读未分，已言服虔胜杜预；《尚书》之篇次未悉，已云梅賾伪《古文》，甚至挟许慎一编，置九经而不习；忆《说文》数字，改六籍而不疑。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，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。”<sup>④</sup>因此，他们虽重考据，却也注意博通，有的还讲求义理。这些批评对于专宗许、郑、贾、马的汉学家无疑有所触动。于是，一些人的学术视野超越东汉，注意到西汉经学、乃至先秦诸子。

其次，对汉学烦琐考据而不讲义理之弊的认识。许多考证著作，总是引经据典，动辄数十万言，看起来专精细密，却不能把握儒学的真精神。章学诚著《文史通义》，意在针砭戴震，指陈经学流弊。他认为考据学“征实太多，发挥太少，有如蚕食桑叶而不能抽丝”<sup>⑤</sup>。有的汉学家逐渐对考据学的义理需求有所认识。段玉裁认为：“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也，定其是非之难。是非有二：曰底本之是非，曰立说之是非……何谓立说？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。”<sup>⑥</sup>精于文字训诂而疏于义理之学的段玉裁晚年自

① 焦循：《述难四》，《雕菰楼集》卷7，第14—15页。

② 王引之：《与焦里堂先生书》，《王文简公文集》卷4，罗振玉辑：《高邮王氏遗书》，1925年刊本，第1页。

③ 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序》，《王文简公文集》卷3，第4页。

④ 凌廷堪：《与胡敬仲书》，《校礼堂文集》卷23。

⑤ 章学诚：《与汪龙庄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9，吴兴刘氏嘉业堂同治元年刊本，第25页。

⑥ 段玉裁：《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》，《经韵楼集》卷12，光绪十年秋树根斋重刊本，第47页。

称：“喜言训诂考核，寻其枝叶，略其本根，老大无成，追悔已晚。”<sup>①</sup>这并非学术自谦，而是晚年的学术反思。许宗彦也有类似言论：“如仅仅校勘文字同异伪脱，或依傍小学，辨析训诂形声，又或缀拾零残经说，所得盖小，私心诚不欲为之。”<sup>②</sup>许宗彦“不欲”从事烦琐考据，也非汉学名家，而他兼通汉宋的取向则具有代表性。稍后，汉学家对这类弊端的认识和批评更多了。阳湖派文宗张惠言指出：“数十年间，天下争为汉学，而异说往往而倡。学者以小辨相高，不务守大义。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，人人自以为许郑，不可胜数也。”<sup>③</sup>因而，张惠言既承吴派《易》学，又不像它那样泥古琐碎。他以《春秋》之法治虞氏《易》，求其条贯，明其统例，被梁启超称为常州今文学派的两大源头之一。稍后岭南汉学家陈澧更认为，“盖百年以来，讲经学者训释甚精，考据甚博，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。其所训释考据，又皆世人所不能解。故经学之书，汗牛充栋，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。此世道所以衰乱也。”<sup>④</sup>此说或许有点夸张，但义理枯萎造成的经学困境却是事实。

既然烦琐考据不能真正领悟和履践孔儒精神，那么另觅途径以阐发儒学的价值也就势所必然。随着学术本身的演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，士大夫对烦琐考据的怀疑、厌倦情绪潜滋暗长，义理之学便以不同形式应运而兴。

其三，一些汉学家呼唤恢复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。乾嘉学派在“实事求是”的旗帜下，埋头于“求真”而不讲“致用”，割裂学术的二重性。对这类弊端，当时及后世学人都不乏批评。钱大昕尚考

① 段玉裁：《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》，《经韵楼集》卷8，第13页。

② 许宗彦：《寄答陈恭甫同年书》，《鉴止水斋集》卷10，咸丰六年重刊本，第12—13页。

③ 张惠言：《安甫遗学序》，《茗柯文编》三编，光绪七年刊本，第22页。

④ 陈澧：《陈兰甫先生遗稿》，《岭南学报》第2卷第3期，1931年。

据,却重视儒家经世传统,认为“儒者之学,在乎明体以致用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执礼》,皆经世之言也。《论语》二十篇,《孟子》七篇,论政者居其半,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,无非持身处世、辞受取与之节,而性与天道,虽大贤犹不得而闻,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。”<sup>①</sup>钱氏主要还是针砭宋学,章学诚则明显针对汉学有感而发:“学者但诵先圣遗言,而不达时王之制度……士大夫之学问文章,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。”“学者昧于知时,动矜博古,譬如考西陵之蚕桑,讲神农之树艺,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。”<sup>②</sup>完全摒弃经世致用传统不仅背离儒学本质,而且显然不利于学术繁荣。有的汉学家如陈澧等人既根柢于汉学,又兼采宋学,也注重经学的实用价值,主张治经“惟求有益于身,有用于世,有功于古人,有裨于后人”<sup>③</sup>。陈澧开始自觉地摒弃烦琐学风,转而注重经学的实用性。

汉学家的反思,加之宋学家的批评,促进了乾嘉学术的调整,一些学者逐渐转变其学术观念和学术领域。

#### 四、汉宋调融:由考据以求义理

汉学家反思的结果之一是,一些学者转治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,经世思潮渐呈复兴之势。然而,嘉道年间转治经世实学者毕竟不多,大多数学者仍然专注于经史研究。仅从学术上看,反思汉学之弊也直接推动了汉宋调融的趋势。

顾炎武倡导“经学即理学”包含通经明道的追求,稍后的考据

① 钱大昕:《世纬序》,《潜研堂文集》卷25,上海涵芬楼1929年影印《潜研堂全书》本,第11页。

② 章学诚:《史释》,《文史通义校注》上册,第231—232页。

③ 陈澧:《与王峻之书五首》,《东塾集》卷4,光绪十八年刊本,第30页。

家阎若璩、惠栋仍讲由训诂以求经义,事实上偏重训诂,经义则退居次要,甚至无形消失。钱大昕说:“有文字而后有训诂,有训诂而后有义理。训诂者,义理之由所出,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。”<sup>①</sup>所谓“义理”即在训诂之中,实际上则是“训诂”有余而“义理”不足。正如章学诚所说:“训诂章句,疏解义理,考求名物,皆不足以言道也。”<sup>②</sup>当然,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震。洪榜记曰:“(戴)先生以为经之至者道也,所以明道者其辞也,所以成辞者字也。必由字以通其辞,由辞以通其道,乃可得之。又经之难明,在一事必综其全而核之,钜细毕究,本末并察,信而有证,合诸至道而不留余议。”<sup>③</sup>戴震力求考据合诸“至道”,并进行义理创新,诚属汉学家的凤毛麟角。

清初以来复兴的理学对士人熏染已久,自然是汉学家讲求义理的重要途径,故他们不同程度地肯定、兼容宋学,犹如王引之所谓“熟于汉学之门户,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”<sup>④</sup>。

一些汉学家治学尊从汉儒,学行则取法宋儒。开创吴派的惠氏三代惠周惕、惠士奇、惠栋究心《易》学,旁及五经。他们尊从汉代经师,摒置宋儒注解。但江藩说,惠士奇也在某些方面取法宋儒,“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:‘六经尊服、郑,百行法程、朱’。不以为非,且以为法。”<sup>⑤</sup>可见,加剧汉宋对垒的惠氏也非完全摒弃宋学,至少在内圣修养方面取法程朱。治学为惠栋所叹服的沈彤通贯群经,长于名物训诂,又不废宋儒义理,后人谓其有清初诸大儒气象。校雠学家卢文弨虽指出宋学在名物、象数、声音、文字

① 钱大昕:《经籍纂诂序》,《潜研堂文集》卷24,第13—14页。

② 章学诚:《原道》下,《文史通义校注》(上)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138页。

③ 洪榜:《戴先生行状》,《戴震全集》第6册,第3380页。

④ 王引之:《经义述闻序》,《王文简公文集》卷3,第4页。

⑤ 江藩:《国朝宋学渊源记》,《汉学师承记(外二种)》,第187页。

方面的缺陷,但对朱子十分尊崇,认为“朱子《集注》自颠扑不破”,“朱子大儒,古今驳难不一,其于朱子无伤也”。<sup>①</sup> 后人评价他“笃于内行,服膺宋儒,潜心汉学,实事求是”<sup>②</sup>。钱大昕把朱熹看做孔孟真传:“孔孟已远,吾将安归? 卓哉紫阳! 百世之师。主敬立诚,穷理致知。由博返约,大醇无疵。”<sup>③</sup> 他们对宋学的内圣功夫相当重视,多所取法。

其实,清代汉学家无论对空虚的宋学多么反感,无论对性理之谈多么厌倦,但如讲求内圣修养,就不能忽视宋儒。因此,比较醇正的汉学家多在名义上或实际上肯定宋儒学行,而贪鄙公行者毕竟不多。比如,刘台拱早年曾读乡贤王懋竑、朱泽云的遗书,以宋儒义理涵养心性,治学方法则多取汉学一途。稍后,随着士林衰腐风气加重及理学复兴,倡导宋儒学行修养的汉学家更多了。段玉裁说:“抑余又以为考核者,学问之全体,学者所以学为人也。故考核者,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,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。今之言学者,身心伦理不之务,谓宋之理学不足言,谓汉之气节不足尚……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。”<sup>④</sup> 道光年间,广东学海堂最初的学长林伯桐被后人看做“宗主汉儒,而践履则服膺朱子,无门户之见”的学者。<sup>⑤</sup> 曾任御史的陈庆镛“精研汉学而服膺宋儒,谓‘六经宗许、郑,百行学程、朱,亭林之言,吾辈当以自励’”。他多次上疏请申明刑赏,指斥权贵,一时声震朝野。<sup>⑥</sup> 类似情形,不一而足。他们把

① 卢文弨:《答彭允初书》,《抱经堂文集》卷18,上海涵芬楼影印初刻本,第18页。

② 《抱经学案》,徐世昌主编:《清儒学案》卷72第2册,中国书店1990年版,第276页。

③ 钱大昕:《朱文公三世像赞》,《潜研堂文集》卷17,第6页。

④ 段玉裁:《娱亲雅言序》,《经韵楼集》卷8,第12页。

⑤ 《月亭学案上》,《清儒学案》卷132第3册,第460页。

⑥ 《春海学案·春海交游》,《清儒学案》卷146第3册,第694页。

治学(宗汉)与修身(宗宋)区别开来,不失为汲取宋学的途径之一。

汉宋调融主要体现在汉学家肯定宋学的价值,汲取其学理。汉学家大多科举出身,早年为了获得功名,不得不长期研读儒经,尤其是朝廷崇奉的宋儒之书。这种经历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淀,即使士子们后来转治考据,也多少会发挥义理之学的潜在作用。兼容汉宋的阮元自述:“元少为学,自宋人始;由宋而求唐,求晋、魏,求汉,乃愈得其实。”<sup>①</sup>阮元治学不如吴、皖学者专精,但具有扬州学派的博通气象。他主持编纂的《国史儒林传》对汉、宋学者都较推重,其幕府也是兼容汉、宋学者的场所。他认为:“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,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,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,未可偏讥而互诃也。”<sup>②</sup>阮元治经以训诂为前提,也不乏义理,还著有《性命古训》,阐述宋学话题。

为京师士人推重的安徽汉学家程恩泽、著名学者邓显鹤等人都倾向于调和汉宋。“绩溪胡氏”的胡培翬认为:汉学、宋学兴盛一时,都是时代“运会使然”,二者各有长处,不可分割。“汉学详于名物训诂,宋学详于义理,以是歧汉宋而二之,非也。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,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。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。”“以汉学为难,得其门径亦非难;以宋学为易,则诚有非易者。”<sup>③</sup>胡培翬的好友、精研《毛诗》的胡承珙也有类似看法:“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,惟求其是者而已;为学亦无汉宋之分,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。汉儒之是之多者,郑君康成其最也;宋儒之是之多者,新安朱子其最也。”<sup>④</sup>他们平实地肯定汉宋各有所长,有的汉

① 阮元:《西湖诂经精舍记》,《研经室二集》卷7,第15页。

② 阮元:《国史儒林传序》,《研经室一集》卷2,上海涵芬楼影印初刻本,第2页。

③ 胡培翬:《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》,《研六室文钞》卷5,道光年间刊本,第24—25页。

④ 胡承珙:《四书管窥序》,《求是堂文集》卷4,道光十七年刊本,第10页。

学家在著述中汲取宋学,如陈澧指出:戴震的《诗经》研究有不从毛、郑,而从朱子者。孔广森的《公羊通义》“亦多采宋儒之说”<sup>①</sup>。

嘉道之际,调和汉宋的潜流逐渐明显。有的人如李兆洛、张履等人的学术根柢本为汉宋兼采,无所偏重,自然主张调和二者,寻找解决学术危机的出路。李兆洛治学不分汉宋,惟以心得为主。他认为:“为考证之学者,援文比类,据物索象,迨其说不能自还,则务繁征博引,以蘄必伸,其蔽也凿,然而考订精勤之功不可没也。为义理之学者,穷理必从其朔,其蔽也或,至于穷高极远而无所薄,然而剖析理欲、教人践履之功不可诬也。归之大要,皆有功于圣人。”<sup>②</sup> 他偏重史学,也治今文经,鄙弃郑玄的古文经学。魏源说,他和庄存与为常州“并世两通儒”。与李兆洛类似的张履也注意“治经穷理”,自述虽“偏重考证一路,惟为汉为宋,则各从其说之长,而绝不参以成见”<sup>③</sup>。道咸年间注重通经致用的冯桂芬“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”<sup>④</sup>。他说:“汉学杂讖纬,朱学近禅,各有所蔽。汉学善言考据,凡名物象数文字形声训诂,非汉儒不传;宋学善言义理,表章大学,于群经中明诚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一以贯之之说,陈义大且远用,能晚出千余年而俨然与汉儒埒,实亦各有所长。”<sup>⑤</sup> 在他看来,宋学自有价值,实非汉学所能取代。“宋儒固不能如汉儒之博洽,而义蕴精微亦非汉儒所有,其有功于圣学正同,以是历数百年莫能偏废。”<sup>⑥</sup> 这代表了道咸以后汉学中心苏、皖学者的学术取向。

① 陈澧:《国朝》,《东塾杂俎》卷11,《敬跻堂丛书》,北平古学院1943年刊本,第9页。

② 赵振祚:《养一斋文集序》,李兆洛:《养一斋文集》,光绪四年重刻本,第1页。

③ 张履:《复顾访溪书》,《积石文稿》卷14,光绪二十年刊本,第10页。

④ 李鸿章:《墓志铭》,《显志堂集》卷前,光绪二年校邠庐刊本。

⑤ 冯桂芬:《阙里致经堂记》,《显志堂集》卷3,第6页。

⑥ 冯桂芬:《太上感应篇合注序》,《显志堂集》卷1,第27页。



深受宋学熏染的浙、粤学者更重调融。民国学者支伟成曾撰《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列传》，其主要人物包括浙江学者许宗彦、金鄂、徐时栋、戴望、徐养原、黄式三、以周父子、朱一新，广东学者林伯桐、陈澧、桂文灿、朱次琦等人。他认为：“独浙中承万氏余绪，言《礼》多兼杂汉宋，嗣竟成为一派。德清戴望由今文而出入宋五子，且表章习斋学说，范围愈扩。于是番禺陈澧、南海朱次琦辈，闻风兴起，终为晚清学术之枢纽焉。”<sup>①</sup> 这里所列名单还不全面，有的学者如朱一新、朱次琦主要根柢于宋学，但所谓“汉宋兼采”成为“晚清学术之枢纽”则是事实。

道光以后，浙江调和汉宋的代表人物是黄式三、黄以周父子。黄式三“博综群经，尤长于《三礼》，谨守郑学而兼宗朱子。尝谓读书而不治心，犹百万兵而自乱之。子以周少承家学，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、宋朱子为最。而汉学、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，尚不合于郑、朱，何论孔孟！”<sup>②</sup> 黄式三认为，汉宋之学无分轩輊，互相依存，因而对戴震、凌廷堪、阮元等人会通训诂与义理之学的路向相当推崇。他著《申戴氏气说》、《申戴氏理说》、《申戴氏性说》等文，汇通汉宋观点，继戴震之后重释儒家争论不休的“气”、“理”、“性”观念。在他看来，戴震发扬程朱真意，不像元明诸儒对宋学任意张扬。这种貌似归宗宋学、实则近乎牵强的辩护，本意仍在推崇汉学，也包含赞赏会通汉宋的学术取向。黄式三治经立足于汉学方法，又汲取宋学议题及思想，注重学术流变，能融会汉宋而不囿于汉宋。黄以周承家学传统，发扬汉学之长，历49年而成《礼书通故》百卷，并有《经义比训》等书。他也摒弃汉宋门户，对宋儒讲求的德性、虚无、义利之辨等论题有所阐发，晚年撰成《子思子辑解》7

① 支伟成：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，岳麓书社1998年版，第146页。

② 《敝居学案上》，《清儒学案》卷153第3册，第793页。